

“五方联动”产业支撑 “南充绣法”实现大脱贫

四川南充全面推行“日暗访日通报”督查机制,倒逼责任落实,在脱贫攻坚一线培养、识别、选拔干部,推动各项问题立行立改,7个国省贫困县全部脱贫



□ 本报记者 王 进 何子蕊
□ 易立权

地处革命老区和贫困地区的四川省南充市,自古以来就是川北重镇。2014年精准识别时,全市共有1290个贫困村、19.1万贫困户、57.8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量约占全省贫困人口总数的1/10。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

然而,近日记者深入当地采访时却发现,截至目前,该市7个国省贫困县已全部实现摘帽、贫困村已全部退出、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由2014年的10%降至0%。四川省脱贫攻坚综合考核中,南充市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被评为“好”等次。南部县荣获“2018年全国脱贫攻坚组织创新奖”。

如此优异成绩,南充是如何做到的呢?

党员干部铸魂 不胜不收兵

“脱贫攻坚,责重如山。能否取得决战胜利,党员、干部是关键、是灵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南充市委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据介绍,近年来,南充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责任、最大民生工程、最大发展机遇,发扬“工匠精神”、狠下“绣花功夫”、做足“精准文章”,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

面对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的市情,南充市委严令各级干部务必牢固树立最关心的事、最后的堡垒、冲在最前方“三种意识”,决战决胜、不胜不休。

全市上下人人以攻坚为己任,个个以克难为指向,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一线,吃住在一线、工作在一线、决战在一线,决战态势全面形成。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一月一调度,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人一周一调度,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村党支部书记、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一天一调度,层

层挂出作战图、制订任务书、列出时间表,顺排工序、倒排工期、倒逼落实。

为了村里的产业发展和危房改造,高坪区原隆兴乡新桥沟村村委会原副主任曹琼蓉连续加班,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2016年5月4日,在向乡上交完扶贫手册回村的路上,曹琼蓉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时至今日,村民们仍传颂着她的事迹。

“正是有了全市广大干部舍小家、为大家、誓要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毅力,南充的脱贫攻坚工作推进坚实有力。”南充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这样说道。

2016年以来,南充市共完成住房安全工程16.3万户,100%的村通硬化路、100%的村安全饮水达标、100%的村通信网络全覆盖,建成贫困村卫生室、文化室各1290处,全市无一学生因贫辍学、无一家庭因学致贫。

产业支撑带动 实现大脱贫

在南部县大堰乡纯阳山村脱贫户汪学超家里,虽然离春节还有近20天时间,但家里的节日气氛已变得十分浓厚,做香肠、熏腊肉、大扫除……见到记者,汪学超妻子姚素琼笑得合不拢嘴。她说,自己家申请了5万元贷款入股村里的食用菌脱贫奔康产业园,政府还帮他们规划了土鸡散养、庭院果树等“四小工程”。去年底,他们家在产业园里面的分红就有12,500元,“四小工程”也变现了3500元,全家一年的收入有七八万元,比3年前起码翻了一倍。

脱贫根基在产业,难点在增收。

南充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说,贫困群众大多是无门路、无资金、无技术等“五无群体”。如何有效组织贫困群众一起发展产业、共同抗风险、抱团闯市场的任务艰巨而复杂。为此,南充探索出“政府引导、群众主体、龙头

带动、金融支持、合作社组织”的“五方联动”模式,共建脱贫奔康产业园,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合作共赢发展格局。目前,全市建成脱贫奔康产业园1023个,带动9.1万户贫困户持续增收。

针对贫困群众发展产业投入大、周期长、风险高、收益低等问题,南充积极创新探索多元投入、利益联结、风险防控“三大机制”,近4年来累计投入财政扶贫资金343亿元,多方组建教育、卫生、产业扶持、小额信贷分险“四项基金”10.64亿元、使用4.92亿元,惠及贫困群众40万人。

产业园区建起来,产品生产出来,还要把产品卖出去,才能真正变成收益。据上述负责人介绍,南充打好“两套组合拳”强支撑,按照“产品种类齐全、生产管理科学、质量放心可靠、来源追溯清晰、带动效果明显”要求,培育300个特色扶贫产品基地(园区),建立南充扶贫产品销售平台(网络),实现零散贫困群众产品集成销售,进一步扩大了南充扶贫产品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创新督查机制 不漏一户一人

1月7日,记者在南充采访时,正赶上南充市委相关部门组成的“暗访组”又一次深入到市县了解脱贫攻坚和长效帮扶的日子。该暗访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虽然现在全市已实现脱贫摘帽,但防止返贫、长效扶贫的任务依然艰巨,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松懈。这是市委下达的头号政治任务”。

据介绍,为把脱贫攻坚工作落到实处,使脱贫攻坚成效得到进一步巩固,让群众满意。南充市委、市政府坚持把压紧压实责任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保证,全面推行“日暗访日通报”督查机制,并逐村逐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

全市先后共组建12个暗访组,进村入户,对工作标准、脱贫进度、干部履职等情况进行全方位暗访督查,并在全市“原汁原味”通报,倒逼责任落实;结合“日暗访日通报”,各区市县扎实开展“查问题、找不足、补短板”活动,脱贫攻坚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和行业扶贫专项暗访,分区

域、分乡镇、分系统进行摸排,逐乡逐村逐户开展排查,推动各项问题立行立改。做到不找完不放过、找不改完不放过、改完不彻底不放过。

与此同时,南充市委全面推行市、县、乡、村“四级联动”问题整改机制,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扶贫领域“3+X”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在严明纪律的同时,坚定推行容错纠错和激励机制,制定施行《南充市建立容错纠错机制“30条”意见》,制定关心爱护脱贫攻坚一线干部“33条办法”,全面推行“三个一线”激励机制,有效解决干部不敢担当、不敢作为问题,让干事者宽心,让改革者轻装上阵;在脱贫攻坚一线培养干部、识别干部、选拔干部。

南充还围绕防范风险隐患持续用力,聚焦产业扶贫、基层债务、项目质量和资金监管、小额信贷、涉贫信访和网络舆情等方面突出问题,提前研判、提早化解,坚决确保不因风险累积影响脱贫攻坚大局。通过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向社会交出了一份精准脱贫、精准扶贫、长效帮扶的满意答卷。



深圳机场:旅客可体验全流程自助服务

近年来,深圳机场通过数字化转型加快智慧机场建设。目前,国内航班已实现值机、行李托运、安检验证、登机全流程自助出行,国际航班也已实现“无纸化”试点运行。图为旅客在深圳机场出发大厅体验自助行李托运。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 摄

地方协调机制探路 形成金融监管合力

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文,将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成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

□ 吴 雨 潘文婷

金融监管政策需要顶层设计,但落地执行离不开地方。如何加强中央和地方金融协作、形成监管合力,一直是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关注的重点。日前,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发文,将在各省(区、市)建立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成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迈出的关键一步。

近年来,我国不断推动金融监管体制改革。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举行,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金融委办公室设在中国人民银行,由中国人民银行设立金融委办公室秘书局负责其日常工作。

“金融委办公室平稳运行后,加强了对金融领域相关事项的统筹研究协调,但地方协调机制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影响监管效率进一步提升。”国家金融与

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通过地方协调机制可以让金融监管体系更加顺畅、高效,以保障中央制定的监管政策在地方能有效执行,避免出现监管真空,并保证执行力度的一致性。

新网银行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认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成立,主要解决了金融监管的横向协调,弥补分业监管的不足,实现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但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半径都有局限,在实践中容易出现两相割裂的监管空间,需要建立纵向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

在此背景下,金融委办公室印发《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建立地方协调机制的意见》提出,坚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权的基本原则,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加强中央和地方在金融监管、风险处置、信息共享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协作。

在组织架构方面,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设在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由其主要负责同志担任召集人,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省级派出机构、省级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以及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财政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

业内人士指出,这样的组织架构有助于加强金融监管的协调能力。一方面,出于防控地方金融风险、服务当地的考虑,我国逐渐将地方金融监管职能及风险处置责任交由地方政府承担;但另一方面,由于地方缺乏专业能力和人才队伍,仍需要坚持中央事权的基本原则,由中央从顶层设计,以达到金融政策制定和金融风险防控“一盘棋”。

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建成后将做些什么呢?新华社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该协调机制主要承担六条职责,包括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加强金

融监管协调,促进区域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推动金融信息共享,协调做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等。

业内人士看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将在处置化解金融风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曾刚表示,风险化解往往需要多部门参与,既需要中央监管部门,也需要地方监管部门。为了保证多方参与的风险处置工作得到高效执行,需要做好协调和压实各方责任,快速、及时地处置风险,以免产生新的风险。

另外,金融风险监测、消费者权益保护等离不开信息的交互。董希淼指出,地方协调机制可以增强金融信息共享,通过打破信息孤岛,提高信息分类处理的效率,可以对于金融风险“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把风险消灭于萌芽状态。

其实,为提升地方金融监管效率和协同性,不少地方已建立

了本地的金融议事协调机制,负责地方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处置。因此,有人提出,在同一个行政区域内,对金融工作同时存在两套协调机制,是否出现协调机制不“协调”的局面?

对此,参与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制定的人士称,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与省级政府金融工作议事协调机制,一个是受金融委办公室的领导和业务指导,另一个受地方政府管理。前者主要协调中央金融管理和地方金融管理事项,监测评估金融风险;后者主要落实属地风险处置,二者职责各有侧重,相互支持配合。

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金融委办公室地方协调机制将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强金融监管合力,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



工信部:强化大数据反诈 发挥联动治理合力

2019年全国共拦截诈骗呼叫10.8亿次,关停重点地区诈骗号码88.8万个

本报记 记者何玲 实习

记者孟佳惠报道 日前,工信部公布2019年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情况。2019年以来,工信部通过综合施策,持续发力,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2019年防范治理电信网络诈骗重点工作工作的通知》,坚持紧抓“以技管网”“以数管网”“从严管网”“协同管网”四条主线,明确“诈骗电话治理”和“网络诈骗治理”两大任务清单,聚焦建立省部两级反诈系统等六大任务,推动防范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拦截诈骗呼叫10.8亿次,关停重点地区诈骗号码88.8万个。

在“以技管网”方面,工信部强调,要不断强化技术防范能力建设,建省部两级反诈系统,用大数据反诈。据数据显示,2019年,工信部和各地通信管理局,拦截诈骗电话6.8亿次,劝阻受害用户52.4万人;工信部组织建设省部两级互联网反诈系统,部系统与19个省系统对接联动,汇聚涉诈域名149万个,涉诈网址900万个,涉诈互联网账号13万个;电信企业则健全完善大数据反诈技术体系,拦截诈骗电话4亿次,拦截诈骗短信15亿次,实现全量境外来电用户提示。

在“以数管网”方面,工信部明确,要充分发挥大数据治理牵引作用,以大数据

“踢网”,整治重点地区。据了解,工信部组织管局、集团、省公司开展三位一体的专项治理,累计通报21期,关停诈骗号码88.8万个;广西、云南两地省级电信企业建立完善大数据“踢网”模型,累计“踢网”81万个。

在“从严管网”方面,工信部要求加强通报,压实责任。据数据显示,2019年,工信部下发电信网络诈骗风险行业和重点地区通报33期,点名问题企业60余次,组织对16省48家电信企业进行现场检查。安徽、四川、河北、青海、新疆、重庆、湖北等通信管理局,加大了实名制检查追责力度,明察暗访渠道网点共计800家。

在“协同管网”方面,工信部提出,要联动联动,将治理合力进一步加大。据悉,2019年,工信部与公安部进一步建立完善工作会商机制,通报重大案件情况,加强对重点问题和重点地区的有效整治。数据显示,通信行业配合公安机关开通“96110”反诈统一预警平台,累计向公安机关推送预警号码超过137万个。

此外,2019年,工信部通过加强电话用户实名登记,探索行业信用管理,提出全面推广人像比对等11项举措。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建立移动转售企业社会营销渠道信用管理机制,曝光问题渠道9批次。

《1版

“猪肉只是CPI商品篮子的一种商品,肉价上涨可能对短期CPI产生扰动,但猪肉及替代肉类食品结构性上涨来源明确,影响和波及范围可控,不会动摇物价总水平稳定的运行基础。”郭丽岩分析说,2020年CPI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因为上半年翘尾比较高,所以稳物价的压力较大一些。

“商品和服务价格的普遍上涨,才叫通货膨胀。”张斌强调,当前,这种相对单一而明确的结构性的上涨,不符合学界界定的通货膨胀。更应该关注的宏观经济指标是,去除能源、食品价格之后的核心CPI,以及具有先导性意义的PPI(生产价格指数)。

他建议,保持1%~3%的核心CPI非常重要,这为总需求管理政策取向划定了边界。围绕重要商品市场保供稳价,郭丽岩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因类施策。宏观总量政策紧盯物价水平中枢指标,比如核心CPI。强化实施结构政策,抑制结构性上涨源传导扩散。同时,健全疫情防控和灾害救助长效机制。二是对症下药。大力推进农副产品现代化生产和统一市场体系建设,破除区域分割、隐形壁垒,治理流通秩序,惩治不正当竞争行为,激发和保护生产者权益和积极性。此外,适当抑制农副产品金融化倾向。三是强化托底。民生“菜篮子”里不仅有肉,还有鲜菜和鲜果,要关注非猪食品的价格变化。减少

物价持续较大幅上涨对低收入群体和家庭的影响,按时足额发放价格临时补贴,有条件地区可合理扩大发放范围和提高标准。最后,要防范物价上涨引发次生风险。

化危为机 推动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面对菜、肉、粮这样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波动,不仅要关注“贵了伤民”,还应重视“贱了伤农”。

“短期的暴涨暴跌,都是在供给层面出现了问题。”邓郁松分析说,一方面,这和生猪养殖结构有很大关系,以散户为主的养殖模式加剧了“猪周期”的波动;另一方面,各个阶段生猪的价格变化,跟出现疫情也有很大的关系,常见的疫病就有8种。

邓郁松说,真正影响价格变化的核心是存栏量、出栏量的波动。“整个传导机制是这样的,生猪存栏量下降,导致出栏量减少,继而猪肉供给量下降,价格上涨。”他建议,进一步完善“猪周期”调控机制,将生猪的“存栏量”作为宏观监测主指标,“猪粮比”作为辅助指标。同时,加强对特殊事件影响下不同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的研究。

在交流环节,大家认为,本轮生猪产能调整后,规模化大企业决策相对更加理性。在“危”中也要看到“机”,如果能够实现中国的生猪养殖产业向规模化和现代化转型,可能为以后走出“猪周期”奠定基础。